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数智时代“文化之问”的科学解答

刘伟兵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马克思立足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形态, 在人本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的转化过程中, 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运用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等概念范畴, 整体性、系统性地建构了文化生成论、文化交往论、文化认同论。当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数智革命带来的“无人化”“数字化”的精神生产, “数字交往”“算法交往”的文化交往方式, 以及数字劳动形式的文化认同实践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阐释力、生命力构成了新的现实挑战。以问题导向为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数智革命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挑战, 深入把握其中的新规律, 系统探讨和发展了文化为谁生成、如何生成的文化生成论, 不仅包含以新闻传播、互联网建设、文明交流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交往论, 也包含了以文化使命、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主体性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认同论。

关键词: 人工智能; 精神生产; 文化交往; 文化认同; 问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3-0049-10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既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也表明了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当前, 学界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 主要表现为三条进路。一是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有的学者关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二是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身的理论结构与逻辑关系等。有的学者分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结构”^[2]、“科学体系”^[3]、“实践逻辑”^[4]等, 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项“重大原理性理论成果”^[5]。三是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功能和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如何建设’等一系列关涉文化形态论、文化本质论、文化主体论、文化领导论与文化交往论的最基础、最核心问题”^[6]。还有的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思想武器, 也是不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行动指南”^[7]。这些研究在多维共建中, 勾勒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谱系, 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研究基础。

已有研究触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但是尚没有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数智革命的问题导向研究, 没有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回答了数智时代哪些文化之问, 以及在问题导向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何种发展。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视

收稿日期: 2024-05-20; 修回日期: 2024-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创新研究”(23CKS053)

作者简介: 刘伟兵, 男, 浙江青田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意识形态与文化, 联系邮箱: wbliu595@163.com

域中,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本身就是理解把握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重要视角。以科技变革的问题导向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重要向度。恩格斯就直接探讨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形成的作用,并提出了“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8]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方法论。20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也助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新现象、新问题的关注,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视野。“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9](26)}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之一就是包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10]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技革命问题导向进行研究,既可以拓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领域,也能深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之中,勾勒出科技变革问题导向的思想生成脉络,明确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为人类文明迈入数智时代后如何发展文化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意义,以及能够以问题导向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成论、文化交往论、文化认同论的创新发展。

一、科学解答数智时代的文化生成之间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其关于资本问题的分析,以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两大科学发现,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解释力,并为当今时代的理论阐释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工具。但是其中一些对工业革命时代的时代之间的回应,以及借助当时实践素材建构的具体理论,需要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不断时代化的丰富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数智时代背景下,科学地分析了智能化的精神生产方式的新文化规律,探讨了这些智能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挑战和创新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成论,建构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篇章。

文化从何而来,如何生成?这构成了文化理论的基本元问题。文化是抽象意识的体现,许多思想家都是从精神维度对其进行把握的,将其看作人主观能动性的产物。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因为无论是何种民族、哪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人们主观意识抽象加工的产物。但是这一观点其实在形而上的逻辑中忽视了以下问题:人的意识从何而来?为何人的意识会进行抽象加工并形成文化?为何个体的主观意识会形成一个社会范畴内的文化现象?只有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科学地把握住了人类文化生成的图景。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黑格尔式的抽象独立的文化,他认为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所生成和规定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1](533)}既然文化是人们实践的产物,那么人们是如何通过实践生成文化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成论的基本内容。

在人本逻辑里,马克思明确了文化生成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精神劳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维度。文化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精神劳动,是人的本质关系的外显。意识虽然受社会存在决定,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具有超越现实的相对独立性。正是由于拥有主观意识,人们在创造必然的社会规律的同时,又蕴含着个体意识的偶然性,进而在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中推进着社会与个体的全面发展。

在生产逻辑里,马克思明确了文化生成是人的精神生产活动,是社会生产的环节。“从生产的视角来看,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构成。”^[12]为何会出现文化?文化绝不是绝对精神的展开形式,也不是简单的人类主观意识的体现。文化的出现是因为生活资料的剩余会促使一部分人脱离物质

劳动，专门从事“精神劳动”^{[11](551)}。正因如此，个体的自主意识就具有了社会化的可能，也就实现了个体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跨越，进而建构了文化形态。

在资本逻辑里，马克思明确了文化生成也会受资本逻辑控制，从而会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融入资本增殖的环节之中。“资本式生产本质上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颠倒式发展。”^[13]在此维度上，马克思以是否为资本增殖生产的雇佣劳动作为区分精神生产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标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14](219)}作为生产劳动的精神生产虽然也是文化生成过程，但是却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增殖，而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14](34)}

此外，马克思还从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认识到资本增殖会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进而促进生产力的智能化变革。“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5]这为精神生产的一般智力革命进行了科学的预测。“‘技术’实质上扮演着知识生产与意识形态表征的角色。”^[16]

当下，在数智时代，数智技术和算力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成的方式，出现了“无人化”“智能化”等现象。数智时代的文化生成虽然依旧是人的精神生产，但是其形式逐渐从个体化走向社会化。如果说原来的精神生产是通过文字、图像、音符等符号元素生成文学、绘画、音乐等文化形式，那么数智时代精神生产的最基本元素就变成了数据。“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17]数据构成了数智时代精神生产的前提，是存在的存在，是决定数智时代文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有什么”。数智时代精神生产的“工具”是算法，也就是处理数据的规则、条件和方法。算法“通过信息的数字编码将观念和物能内在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物能和信息关系层次构成了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18]。而数智时代精神生产的“方式”就是模型。模型是数据在算法训练后的机器学习结果，是特定的数据结构。模型是数智时代精神生产“无人化”“智能化”背后的“主体”。此外，在数智时代推动精神生产最为基础的生产力是算力。“算力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第一生产力。”^[19]算力就是计算能力，它为数据训练和算法运行提供计算资源，降低技术应用的门槛，从而决定了数智技术在精神生产方式上的大规模应用。数据、算法、模型和算力的合力运作，推进了数智时代精神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出现“无人化”“智能化”等新现象，也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数智时代的文化主体是机器还是人？如何界定数智机器创造的文化？机器运用于文化领域究竟是对文化的丰富与发展，还是贬低与异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数智时代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变革的基础上，分析了如何在数智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成论的丰富与发展。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重点分析和回应了信息化、智能化生产方式变革下的文化生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数智时代文化生成面临着诸多挑战，并提出要正确引导数智时代文化生成的发展方向：“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20](159)}在数智时代，在“无人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精神生产中，因为受到社会化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文化生成环节“良莠不齐”的现象。面对数智时代文化生成的新现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贡献在于明确了数智时代的文化生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171)}。这在事实上把握了数智时代精神生产“无人化”背后的“总体工人”主体，明确了“总体工人”主体是人民，而不是资本，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而不是为资本增殖而创作。“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9](45)}这一理论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成为谁生成这一问题的理论发展。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如何在数智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之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在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要在发展过程中传承,在传承过程中发展,并且要充分借助新的精神生产方式,展现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技术、算法技术、元宇宙技术等的应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21](325)}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的技术只是文化生成的手段,而不是主体。“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21](325)}在新时代,“数字故宫”“数字敦煌”“云游长城”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项目层出不穷,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化发展中传承的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智时代运用新技术以数字形式“活”起来了。

二、科学解答数智时代的文化交往之问

文化生成之后还有一个文化交往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文化交流、文明碰撞、文化传播的理论关键。马克思通过精神交往把握文化交往,从实践交往理论出发,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切中了精神交往的实质,明确了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相对应,都统摄于人的实践交往之中,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

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明确了精神交往的本质就是实践交往。“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1](524)}这一把握事实上明确了精神交往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理念。紧接着,马克思探讨了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的关系。一方面,精神交往受物质交往的规定。物质交往决定了精神交往的方式、材料。无论是文学交流还是艺术交流,都需要依赖一个物质实践的载体和方式。“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1](524-525)}另一方面,精神交往对物质实践具有反作用,且与物质交往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更多地表现在相互作用中。”^[22]

唯物史观除了在实践中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精神交往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主体,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维度中把握精神交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发展。其中,人的文化精神关系的丰富除了依赖精神生产以外,更需要以精神交往的方式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交换。“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1](46)}在现实中,一个文明越开放、文化交流越多,也就越繁荣。

如今,随着数智技术的出现和大规模应用,产生了交往方式的变革,推进了精神交往的新变化。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论的丰富发展带来了可能。

数智时代的文化交往出现了“数字交往”的新现象。“数字交往,就是人们运用数字代码、通过互联网来传递、交流信息而实现的交往。”^[23]在数智时代,以往的音乐、图像、文字等交往形式都逐渐数字化。这就使得人们更加热衷于在互联网上进行交往。同时,点赞、评论等数字劳动建构了新型的数字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网友关系、人与机器之间的人机关系等。在生产领域中,这一数字交往现象表现为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数字生产的群体,包括视频剪辑师、数据训练师、程序员等。只有如此,才可以生产数字产品以供交换,进而推进数字交往。如今,人们可以随时消费网络视频、网络小说等数字产品,而且在数智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言语模型等新型数字产品,还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社交平台。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在人与人、人与机器的数字交往过程中,建构起了新型的数字文明、智能文明形态。

不仅如此,数智时代文化交往的方式表现为算法形式。借助新型数智技术,文化交往中出现了数

字交往现象。那么人与人、人与机器是如何通过数智技术进行数字形态的文化交往呢？事实上就是依赖于算法。在数智时代，个体与社会如何交往、怎么交往，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算法的运用。算法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完成对数据的分类、回归、聚类处理，其运行逻辑事实上是一种数理逻辑，即把某个问题以数字的方式通过证明论、集合论、递归论等方法获得确定性。这使得算法在建构新型交往关系时，遵循的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确定性逻辑。于是，算法规定的交往形式就具有了精准、高效、科学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算法能够通过重塑人的交往方式来丰富人的社会关系，但算法又被资本应用，成了束缚人的交往关系的症结。“算法的智能特征使其被广泛地应用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实践之中，从而将算法技术逻辑植入意识形态生成过程，推动精神生产的社会化、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数字化变革，催生了算法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算法现象。”^[24]

一方面，算法使得文化交往更加频繁，一定程度上扩展与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算法的本质是数理逻辑的求解，是统计意义上追求的确性。这种高效性、科学性节省了人们扩大交往所需的时间，使得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交往。人的文化交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依赖交通技术进行空间意义上的文化交往。交通技术越发达，就越能节省人们交往的时间，从而使人联系得越加紧密，交往频率就越高，内容就越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就越丰富。第二个阶段是互联网时代下人们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海量信息共享基础上的文化交往。这一阶段的文化交往超越了空间限制，以虚拟的网络拓展了人的交往场域和关系维度，空间上的交往时间被压缩至极限。但是，这一阶段的文化交往在信息检索、交流过程中还需要时间。第三个阶段就是广泛应用算法后的文化交往，此一阶段的文化交往压缩了信息检索、交流过程中的时间。算法技术赋予机器以智能化特征，能够帮助人们快速检索信息，并科学回答疑问。这不仅意味着人们交往的内容丰富了，还节省了交往的时间，提高了交往的频率，有了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

另一方面，算法被资本应用，重塑了人的交往形式，使其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构成了重要的选择和评判的标准。算法精准、高效、科学的特征使其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算法嵌入资本逻辑之中，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与接触世界的重要方式，决定了人们能够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可以说，人们借助算法认识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算”出来的世界，是对这个世界的重构。而贯穿这个重构世界过程的是算法背后的应用逻辑。事实上，学界早已经关注到算法被资本应用的情况，会导致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出现“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等现象。“当筛选过滤的力量没有限制时，人们能够进一步精确地决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什么是他们不想要的，他们设计了一个能让他们自己选择的传播世界。”^[25]

面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新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答数智时代文化交往的文化之间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回答了数智时代新闻传播等文化交往方式如何发展的时代之问。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功能主义出发，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明确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26]。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面又深刻地把握数智时代新闻传播交往方式变化的基础上，认识到了新闻舆论等文化交往的规律，其在数智时代表现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方面。传播力是文化交往的广度；引导力和影响力是文化交往的功能；公信力则是文化之所以能交往的前提。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27](311)}。最后，面对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等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认为文化交往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技术的应用逻辑。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在数智时代算法普遍应用背景下，如何进行新闻传播也进行了论述，提出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还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从而在文化交往维度上驾驭资本逻辑。“坚持党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28]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答数智时代数字交往的时代之问时,发展了在互联网场域中如何开展文化交往的理论。“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21](319)}面对元宇宙、大数据、算法、语言模型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下文化交往的重要场域,并提出了媒体融合的重大命题:“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29]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互联网看作文化交往的重要场域,重视推进互联网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把网信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30]的观点。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带来的媒介变化,加快新旧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27](317)}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数智时代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丰富与发展了对外传播、文明交流的思想:“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1](316)}数智时代的文化交往相较于以往会更加频繁、更加便捷,它深刻影响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建设,关系到国家形象建设。目前,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对外传播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就是提出了“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7](312)}的“自塑”命题。加强对外传播,本质是文化交往的话语权建构,除了需要注重内容、话语范畴的转化,还需要充分利用数智技术。“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7](318)}在新时代,抖音等软件率先出海,并在算法技术的推动下有力地推进了文化输出,传播了中国的声音,塑造了中国的形象。

三、科学解答数智时代的文化认同之问

在文化生成和文化交往之后,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这关系到文化是否成立、文化是否属于人的主体性等问题。文化认同是文化交往的结果,也是文化生成的目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关切,切中了文化本质论、文化主体论、文化功能论的理论症结。可以说,如何进行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何为,是回答何为文化、文化为何、文化何用等系列问题的关键。

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指出文化认同表面上看似是个体的主观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经过客观化和社会化之后的“主观”选择过程;文化认同看似是抽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实际上是通过具体实践而逐步生成的过程。文化认同是主体思维的选择,这点毋庸置疑。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科学地回答了主体思维为何会做出认同这一选择,以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认同。

在唯物史观中,文化认同的本质其实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不仅将人的本质关系外化,还将对象化事物的关系复归至自身,嵌入并重构了自身的文化关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1](210)}正是这种“生成—复归”的张力关系切中了主体自身的关系范畴,进而在塑造主体关系范畴的过程中建构起了文化认同。“‘我’已经成为文化体系所改造了的‘他者’了。”^[31]所以,文化认同不只是个体的主观选择,而且是个体进行感性对象性活动后的对象化结果,包含了社会整体结构

的意识产物。“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32]而且，文化认同不仅是个体与社会的文化关系结合过程，还是个体的文化关系生成过程。“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3]

如今，数智时代通过改变文化领域内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认同的实践逻辑，进而对文化认同提出了新挑战。

在数智时代，文化认同出现了实践方式上的变化，即如何认同的变化。在数智时代，文化认同出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实践方式。数字信息技术和算法技术广泛运用，人们对互联网文化产品的每一次点击、浏览、点赞、评论等，都构成了数智时代文化实践的方式。贯穿于数智技术之中的数理逻辑在统计学意义上寻求确定性时，其文化认同的表现就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字劳动结果。因此，在数智时代，个体的文化认同往往就表现在其日常浏览和关注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的统计特征上。

但是，这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量化结果多的数字劳动行为就可以表明个体在主观上已经认同了某种文化吗？例如，个体在观看短视频时，如果停留在某种类型的短视频上的时间较长，或者说个体对某种类型的短视频点赞、评论更多，是否就可以说个体认同某种短视频背后的文化呢？答案很明显——不是。因为这只能表明个体更加关注某类短视频，或是平台向个体进行推送时使用的算法更偏好此类短视频而已。

平台推送时的算法偏好切中了数智时代文化认同的第二个问题，即数智推荐的“文化”，以及智能算法等“无人化”生成的“文化”能否算作个体自主选择认同的文化。在数智时代，个体所接触的文化存在两个新现象：一是接触的文化并不是自己的主观选择，而是平台想让你关注的文化；二是数智技术以“无人化”的方式自动生成图像、音乐、视频、小说等文化作品。就前者而言，唯物史观早已经明确，个体主观选择本身就是社会结构对个体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结果。即便是在前数智时代，个体“自主”选择的的文化认同本身也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是个体文化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数智时代的偏好推送只不过是运用算法对个体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就后者而言，在数智时代，算法等数字劳动“无人化”的背后是社会总体工人的主体存在。数智时代的“无人化”文化生成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无人”的机器文化，而是数智参与到了文化生成过程之中。在数智时代，机器自主生成文化作品的背后是有的人提供代码设计、有的人提供数据抓取、有的人提供算法程序等。所以，数智时代的“无人化”文化自主生成还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其文化规律依旧受到人的实践逻辑的规定。

但是这又指向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数智时代的文化认同中出现了文化主体危机，也就是说生成与复归的文化社会关系是被个体获得，还是被他者获得？这一过程究竟是主体的发展，还是主体的异化？文化认同原本应该是个体文化社会关系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但是如果个体是在算法的推荐与控制下进行的认同实践，那么个体是否会获得这一文化社会关系？在现实中，算法影响下的偏好往往被长期、大量地投放给个体，投放的既是个体喜欢的文化类型，又是符合资本增殖的文化产品。这就造成了个体文化社会关系的片面发展，造成了个体的文化偏见、信息茧房等异化现象。“人是目的这种范式在人工智能时代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与质疑。”^[34]

因此，在数智时代，针对如何认同文化、认同何种文化，以及文化认同后究竟是对个体的发展还是异化，都需要进行时代的破题。面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答数智时代文化认同的时代之间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理论。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文化使命方面的内容，回答了数智时代如何认同文化的问题。如何认同文化，也就是文化主体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建构新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文化使命论的方式科学回答了这一问题。“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35]⁽¹⁾新的文化使命中蕴含着守正创新的方法论自觉，包含

了对最新科学技术的运用。这是因为“人类发明和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往往标注了人类社会不同的‘技术形态’，进而标注了人类文明形态不同的特征”^[36]。在数智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所建设的文化形态绝不是旧的文化形态，而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文化形态。“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7]正因如此，文化才能通过丰富的文化产品和广泛的文化交流而不断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才能够具有竞争力，传统文化才能在现代技术形态里获得新的文化生命力，才能真正“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9](43)}。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回答了数智时代认同何种文化的问题。面对数智时代文化自主生成和多种应用逻辑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意识形态是具有阶级性的社会意识，反映了文化思潮的政治性和阶级利益。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认同何种文化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认同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人民普遍利益诉求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认同的文化在内容和形态上需要能够实现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和主流意识形态相统一。

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价值观层面提出了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文化的根本属性和发展方向，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价值力量的支撑，都需要有凝聚社会意志和力量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38]。因为“核心价值观，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39]。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实上为文化认同提供了价值指向，即要认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要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引领文化建设。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数智时代的文化生成和文化交往进行着价值评判、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自然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规避资本逻辑等对文化的侵蚀。

第三，在数智时代，文化是谁的文化，是人的文化还是机器的文化，抑或是数智技术背后应用逻辑的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第二个结合”回答了数智时代的文化主体性危机问题：“‘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35](6)}“第二个结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规定了在数智时代，无论何种应用逻辑生成的文化，或何种机器“自主”生成的文化，其文化主体都应该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文化主体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就是明确了文化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是人民，而不是物、机器、算法、资本等。文化主体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问题，明确了中国发展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条件下，在回答当时的时代文化之间的过程中，把握住了文化的普遍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包含以数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数智变革的问题导向上具有三重意义：一是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宣传传播、意识形态工作等实践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部分内容有着直接的回应并进行了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新时代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科学指南；二是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文化主体、精神生产、文化交往等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了新的科技逻辑下的理

论提炼与术语革命，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阐释力、生命力、指导力；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在数智时代面对一系列文化领域内的新问题、新现象的人类文明提供了新方案、新智慧。

参考文献：

- [1] 黄力之.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重构[J]. 理论与改革, 2023(6): 1-11.
- [2] 孟宪平.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结构论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6): 1-10, 241.
- [3] 张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J]. 求索, 2023(6): 22-28.
- [4] 郑敬斌, 陈艺璇.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1): 25-33.
- [5] 金民卿, 古晓兰.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理性理论成果[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1): 14-24, 2.
- [6] 张彦, 杨思远.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其逻辑展开[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 44(6): 1-9, 221.
- [7] 付文军.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 宁夏社会科学, 2023(6): 5-11.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1.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0]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1).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李厚羿.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产理论探析[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 9(5): 38-45.
- [13] 陈广亮, 魏淑萍. 资本批判与扬弃: 马克思的思想及启示[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4): 96-104.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02.
- [16] 王金良, 叶文杰. 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 ChatGPT 时代的权力悖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2): 171-182.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06.
- [18] 王天恩. 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层认识论意蕴[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0(1): 97-105, 175.
- [19] 米加宁, 刘润泽. 大算力与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 基于 ChatGPT 的技术影响与实践展望[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3(2): 13-18.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22]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7.
- [23] 张建云.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数字交往”探析[J]. 学术界, 2022(9): 13-20.
- [24] 刘伟兵. 算法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算法[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1): 152-160.
- [25] 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31.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28]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83.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197.
- [30]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47.
- [31] 王晓升, 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6.
- [32]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229.
-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87.
- [34] 王翔, 何睦.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应对[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3): 174-184.
- [35] 人民日报评论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36] 黄建军.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10): 85-104, 206.
-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10.
- [38] 吴潜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反思[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6): 15-18.
- [39]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38.

Scientific solu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s on Culture to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in AI age

LIU Weibing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hnological forms brought about by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human-centered logic, production logic, and capital logic, Marx,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by using conceptual categories such as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holist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ed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gener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At present, the “unmanned” and “digital” spiritual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algorithmic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identity practice methods in the form of digital labor, all of which are brought about by the AI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once-in-a-century drastic change, pose new practical challenges to the interpretive power and vitality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Taking the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s a method, in the face of the new phenomena,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AI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once-in-a-century great chang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deeply grasps the new laws therein,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and develop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generation regarding for whom and how culture is generat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at includes contents such as news dissemination, Internet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dentity that encompasses cultural missions, ideology,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Key words: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iritual production; cultural interaction; cultural identity; problem-orientation

[编辑: 郑伟]